

宿 疑

第一章

1725年10月12日 星期五 沙榔东 巴黎近郊

我们的这位胡先生 具体地说 胡若望先生 此时双脚站在接待厅门道内 伸长着脖子把头探进室内 两眼转个不停 向里张望了一阵。室内，几十个穿着教士长袍的神职人员占满了所有的长椅。室外，给胡若望套上外衣并将他从牢房押送到此的管理人员紧紧地夹在他的两侧，以防他因受刺激而做出某种意外的激烈举动。胡若望本人并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被押送到这里来 因为不但没人告诉他 而且也没人能有办法告诉他。胡若望不懂法语 根本不可能开口用法语询问任何问题 而将他押送到此的人对中文也一窍不通。

两年半前，胡若望被当作精神病患者送进了位于沙榔东的医院 自此与世隔绝。由于从中国带来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 此时的胡若望身上套着又脏又破的中国式短衫和衬裤，脚上一双早已不成型的中式袜子紧绷绷地塞在烂了个大破口子的烂布鞋里。他的肩上还耷拉着半截欧式短外套，一头鸡窝似的长头发则顺着后脑勺乱趴在后肩。“他看上去就像刚从棺材中挖出来的死尸 脸色惨白、憔悴。”当时在场的戈维理神父在遇到胡若望三天后写道：“由于既无好身材 又无动人的、表面胜于他实际处境的面孔 他看上去更像个深受饥饿折磨的流浪者或叫化子 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知文识字的中国人。”

戈维理神父当时也在室内，与别的神父挤在室内一隅的一条长凳上。胡若望头伸到室内时，戈维理神父用汉语向他打了声招呼。这突如其来的乡音 使胡若望的耳根子猛然一震 心跳顿时加速 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他迅即往声音发出的地方扭转头去。当胡若望看到戈维理时，他身后墙上挂着的镶在镀金画

框内的基督教油画也同时映入视线。见到画中有副十字架，胡若望忽地举手冲它一指，不顾大庭广众的惊异目光，扑通一声，合起双膝倒地就拜。一连磕了五个响头之后，他方才缓缓爬起。这是胡若望用他自己的方式对画中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表示的尊敬。随后，胡若望走进室内，以中国式的礼仪，双手抱拳、低头鞠躬，向每一个人打招呼。然后，在众人的力劝下，他才在一张凳子上弯腰落座。

胡若望和戈维理神父畅谈了一个多小时。戈维理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这是因为他在中国，主要在广州地区作为传教士生活了二十三年之久。当英国商人在该地找不到愿意给他们作翻译的中国人时，戈维理神父还帮忙兼做翻译。戈维理不仅询问了胡若望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几近衣不遮体、一贫如洗的困境，还问了胡若望为什么没有与傅圣泽神父签订工作合同的原因。那是因为后者把他从中国带到法国来的。胡若望口齿清楚地详细回答了戈维理的每一个问题。最后，当戈维理神父问胡若望是否有问题要问他时，胡若望明明白白地表示他有一个千思不解的宿疑。那就是：“他们为什么把我关起来？”

出发

第二章

1721 年 9 月 30 日 星期二 中国广州

胡若望被任命担任门卫。他是多梅尼可·培罗尼 (Domenico Perroni) 神父亲自决定的人选。在中国的培罗尼神父入乡随俗 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 叫潘如。潘如神父当时的职责是为罗马福音传信部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管理中国广州当地的天主教圣公会。这个天主教圣公会代表罗马教皇 或者说企图代表罗马教皇 在广州 地区进行各种传教活动。胡若望的工作则是检查所有进出这个天主教圣公会的人员。圣公会坐落在一个大院内。大院里不但有座颇具规模的教堂，还有潘如神父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人员以及其他住户。对于门卫而言 有时是否允许来访客人进入这个大院 其判断全凭微妙的直觉经验。广州人易躁，西方人在当地经常不受欢迎。

让胡若望当门卫似乎是个明智的决定。胡氏年庚四十，是个鳏夫。其妻数年前去世，留给他一个不日即将长大成人的男孩。胡氏以后未再续弦。胡若望也有不少兄弟 在家里 他除了育子养母外 还扶养着一个弟弟 四人共居一处。胡若望全家虽然住在广州，但他的祖籍却并非本地。他出生在广州城外西南地区的乡间 该地河溪曲绕 靠近商业城市佛山的延伸区域 属于珠江三角洲。尽管胡氏祖先数代前早已从北面的江西迁到广州 但胡若望仍自认为他是个江西老倭。另一方面 胡若望还是个相当有学究气派、并极虔诚地向往学术的人。在当时的中国，

天主教圣公会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也译作罗马神圣会。

② 原文 Canton 应指广州 明朝时亦以广州称之。作者将广东省写为 province of Guangdong。

如果有人被说成有“学究气派”并不表示他通晓哪门欧洲语言，但却意味着此公通过了保证其日后仕途的科举考试，知文识字，能写工整的毛笔字，还通达古词旧诗。由于职务的需要，该人还会将每一需要记录的事项笔录下来。知文识字的重要性，从潘如神父的一个侍者在 8 月份时曾搞错一封极其重要的信函一事上就可看出。那位侍者当时是华南地区圣公会的下级管理员。作为下级管理员，其职务包括处理圣公会与地方传教士以及罗马教廷之间相当机密的通信联系事务。在那次事件中，此人将本来应该寄给耶稣会的信，错寄给了其竞争对手之一的另一个教派。那个教派是方济各会 (Franciscan)。在中文中，方济各会的别称和圣公会为同音异体字。可以想见，这封错投的信所产生的结果是非常令人尴尬的，甚至有损耶稣会的扩展。因为方济各会当时为扩大发展，也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该封信中所罗列的重要信息。

胡若望献身于基督，其长年以来的信仰虔诚是有目共睹的。他是在 1700 年十九岁时入教的。当时耶稣会的神父盖司帕·卡司呢 (Gaspar Castner) 和若望·劳瑞提 (John Laureati) 在佛山一带大力布道，为建教堂和营造一个生气勃勃的基督信仰区日夜奔波。胡若望受浸时，取了教名若望 (John) 以示对若望·劳瑞提神父的敬意。他的儿子出生时，也接受了洗礼，还以盖司帕 (Gaspar) 为其教名。显然，这同样是胡若望用以表示对盖司帕·卡司呢神父的敬仰之意。

由于对基督的了解以及他本人对基督教的坚定信仰，胡若望还被挑选为可直接接触圣公会的传道师之一。这个职位的任命可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当时在广州，华人传道师在基督信仰方面的勤勉和虔诚有着相当令人羡慕的名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中国人同本国人谈论宗教信仰问题远比同西方人

谈论要直率得多，欧洲传教士往往让华人传道师接触那些可能会入教的人 去发现那些人的内在疑虑 并帮助解决那些人的家庭困难。因为诸如此类的问题通常妨碍他们宗教信仰的升华。

华人传道师还努力在公共事务上尽力。他们每天清晨清扫街道，照看被某些绝望的父母所遗弃的婴儿。那些孤儿通常因患病或营养失调而在生死边缘挣扎。这些孤儿被带到有华人传道师驻扎的各类传教机构，并立即受洗。受洗后的孤儿要是不幸早夭，那他会被认为至少已得到了上帝的恩泽；要是生存下来 那么中国基督徒的家庭就会收养这些小信徒。除此之外 传道师还有与医院工作人员共同治疗弃婴的协定。譬如，当医院工作人员告诉传道师有孩子去世时，传道师会立即奔赴医院为该孩子洗礼 欧洲来的神父是不敢贸然去医院里面的 因为那里一直有汗流浹背、玉肌隐现的当班女护士 万一出现丑闻 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广州 天主教在 1719 年曾为一百三十六个婴儿洗礼 ;1721 年曾为二百四十一一个婴儿洗礼，尽管老天爷知道到底有多少其他婴儿被抛弃在荒野或市井、不幸早早夭逝。

18 世纪的广州府怎么说来也算得上是个大城市。如果必须将坐骑留在郊外而坐竹轿进城，没有一小时是到不了市中心的。住在广州当地的欧洲人猜测，当时城市人口大约有一百万。熟悉广州也了解巴黎的人则认为广州与巴黎一样大。不过由于广州的建筑大都以单层为主，真正的面积很难估算。广州府由四个相互毗连的城市组成。在珠江北岸离水不远、以围墙隔起的地区被称为“中国城” 地方总督衙门就设在该城内。总督的主要职责是皇帝的对外贸易顾问，欧洲人把总督的官名翻译为“Hoppo” 中国城内街道狭窄、商店毗连，到处挤满了人。在中国城的北面则是另一个用围墙隔起的区域 称“满洲城” 或“鞑 鞑城”。这是满洲人占领中国后建造的。满洲城内驻扎着满洲人

的卫戍部队，广州府的官衙也在其中。城内的街道宽敞、气派，路面铺着排列有序的石块和石板。大街上还有数座两侧对称、成一条直线矗立的凯旋式拱门，将街道点缀得颇为壮观。此外，满洲城内还有一些风格独特的建筑物。那些建筑物是正规的楼房，为当地官吏举行科举会考以及举办庄严的祭孔大典所用。在这两座被围起来的城市西面 则又是另一个城市 也就是广州商业和居住区的核心。街道上平整地铺着青石板。沿江一带被商铺、住家以及一些殷实的商家所拥有的货栈挤得寸土不留。这个区域洋溢着富裕和成熟的舒适气氛。大街上处处支着大布篷，用来阻隔火焰般的盛夏烈日。第四个城市则沿珠江边缘而建，其部分还嵌在江中水路及运河中迷宫般的小块土地上。这里是赤贫如洗的百姓和船民的王国 大小木船林林列列 混杂的桅杆直插云天，一望无际。一个法国观察家将这种景象形容为：“船排成船街 船街排成大道。”

欧洲来的居民分居在广州几个不同的区域之内。在城的西郊 有些欧洲风格的教堂 葡萄牙耶稣会信徒与传教士住在那一带 在中国城的北郊 则住着法国耶稣会信徒与传教士。在那两个地区之间，则混杂着其他教派和罗马福音传信部所属的圣公会。在江边的那块地区 即紧挨着中国城与西郊的南边 有属于法国人的货栈和守卫室。西方商人称之为“工厂”。这块地区属于最繁荣的地段之一，是法国人以精明的交涉手段从中国官吏那里取得的，他们同时也得到了永久居住权。而从其他西方国家来的商人和政府官员 如英国人、荷兰人 以及哈布斯堡朝皇帝的奥斯坦德^①的臣民们，则像广州的雨季周期和叫人摸不着头脑的国际政治一样 来了又去 去了又来。

^① 奥斯坦德(Ostende) 为今比利时城市 市内有国际海港。

进出中国的葡萄牙船只可以利用该国所占领的离广州不远的殖民地澳门。而其他西方国家到广州的远洋船，则必须抛锚停在珠江下游 10 英里之外的黄埔岛 (Whampoa Island) 边。岛上，总督大人的下属对外国船只进行注册登记、测量船体大小以确定关税。也在这岛上，大批已被购买的货物等着被装运到欧洲。岛上还有用竹子搭建的简易房子并存放着不少席子。席子不但用于晒干船帆和储藏补给品，身体体弱或生病的水手还将其作为休息与运动的用品。此外，远洋船上的西方商人和水手要是想去广州的话，必须从该岛搭乘由中国人驾驶的小艇或舢板。

在广州，罗马天主教圣公会成了所有欧洲人生活的中心。圣公会的潘如神父是个大忙人，平日连坐下的时间也难得抽出。他每日不是为公职要到其他教会去，就是去澳门。而潘如神父近来更是忙得连走路都两袖生风，脚跟不着地。这是因为神父要为眼下正在中国的罗马教皇特使嘉乐 (Carlo Mezzabarba) 的回国安排各种具体事项。尽管如此，当潘如神父不在本地时，令人兴奋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举个例子说 樊守义 [教名路易·樊 (Louis Fan)] 去年就曾到过本地。作为一个山西省北部出生的天主教皈依者，他在旅居欧洲十年后，令人吃惊地又返回故国。樊守义皈依天主教之后，担任耶稣会传教士福然塞司蔻·浦莪瓦纳 (Francesco Provana) 的助手 福然塞司蔻·浦莪瓦纳中文名为艾若瑟^①。当

艾若瑟 (Provana, 1662—1720) 神父 原名 Antonio Francesco G Provana, 生前为耶稣会传教士。1707 年受康熙皇帝所嘱，携助手樊守义共赴罗马，向教皇阐明清朝政府对祭祖敬孔的立场、中国天主教徒对祭祖敬孔的信念以及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为推广布道，大多认可中国人祭祖敬孔的传统等问题，但诸解释均因与教会立场相左而遭罗马教皇与教廷坚拒。艾若瑟终在 1720 年与樊守义乘船回中国，考虑到今后在中国将面临的传教工作之困难，艾若瑟所受打击之大，精神负担之重均可见。

康熙皇帝颁下圣旨 命令艾若瑟到罗马面见教皇 去完成一项特殊外交使命时，艾若瑟便带着樊守义一起上了路。他们先到了葡萄牙 然后再从那儿到了意大利。在欧洲 樊守义目睹了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异邦城市及内海，并亲眼见证了自然与人间的奇迹。樊氏在意大利时 还两次被教皇召见。他学习意大利语 并且最终还被晋升为牧师。十年后，功成名就的樊守义与艾若瑟神父又一同搭船返回中国。但不幸的是艾若瑟神父意外地在船上因病撒手西归。当他们所搭乘的船最终在澳门码头靠岸时，樊守义紧护着安放神父遗体的棺木一起上了岸。澳门军方和政府将此消息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驿站飞马速报康熙皇帝，樊守义本人则在清朝帝国军队的保护下由内陆的水路被护送到了广州。在广州，樊守义寄宿在天主教神父宿舍。地方总督和康熙皇帝的一个特使不久便召见了。他。不及几日，政府送来皇帝的命令 传唤他去北京当面向皇帝禀报。出发之前 这位亲身渡过西洋的中国人樊先生甚至还开始动笔写起自传来。

尽管樊守义的欧洲探险经历可能被大多数人逐渐淡忘并被当成一种逸闻 但在圣公会内部 外部世界的情况却通过来访者源源不断地输进我们这个门卫兼管理员胡若望的脑海里。譬如教皇特使那儿经常派人来访，这些人亦并非属于同一教派。除了耶稣会教士，还有奥古斯丁会教士 (Augustinians)、方济各会教士 (Franciscans) 以及多明我会教士 而这些人都是教皇特使团的成员。此外 出入于胡若望所在圣公会的 还有刚从码头下船的法、英商人 船上的管理人员 法国工厂的总管与厂里的职员，以及称之为法国东印度公司的 (Compagnie des Indes) 国有贸易公司人员。

在这种环境下，胡若望的眼界变得开阔了，他开始酝酿一个大胆的计划：他要到罗马，他要觐见教皇。

1721年10月6日 星期一 广州

傅圣泽神父终于熬过又一场重病，感觉稍稍好了些。8月份以来神父一直病倒在床，死神甚至几度向他招手。神父的重病早在年初就有征兆。当初他在严冬季节从北京一路南下，过长江时又被顶头风吹个正着，身体受寒，以致落下病根。

神父的病症现在减轻了，健康也正在逐渐恢复。可另一方面，他也实实在在地失去了两个多月宝贵的写作时间。经过一场大病，神父最近对人必有生死之宿命有了切实深刻的体会。他留下的信中也流露出了时年四十七岁的他惟恐其毕生的研究在即将开花结果时因非命而被毁于一旦之心境：“今年我正值生辰四十七岁。所谓一年光阴，虽仅仅为六个月之两倍，但于我而言，是极其珍贵的。”感到万幸的神父，还有其他可想见的原因更使他自我感觉良好。那就是他与众不同的一些特殊观点。尽管他的这些观点鹤立鸡群，且使他的上级对他颇不以为然，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些上级多半比他年轻，神父认为他们不过是有预谋地在干涉他的研究工作。

严格地说，1722年3月12日之前，傅圣泽神父还不到四十七岁。小小的夸张也大可原谅，因为神父本人已确实活得够充实、够长久的了。傅圣泽生于法国著名葡萄酒产地勃艮第的韦兹莱镇。他毕业于巴黎路易-拉-古兰特（Louis-le-Grand）耶稣会神学院，并在1681年他十六岁那年皈依了修道会。二十岁以

后，傅圣泽在神学院给那些新从法国各省来到学院寄宿学习的年轻学生讲授数学，并当他们的个人教授。傅圣泽在 1693 年被授予牧师资格，次年他自愿报名到远东传教。当时他并没有刻意指定哪个国家 因为对他来讲 无论挑选他去日本、暹罗或是中国任何一国去传教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被挑中去中国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①鼓励法国神父到中国去，以加强法国在中国的影响。傅圣泽于 1699 年到达厦门 之后在福建和江西两省传教了很长一段时间。 1711 年 傅圣泽作为翻译解读中国古典作品《易经》的专家被召进北京。

1720 年 11 月，也是傅圣泽到达中国九年之后，他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要他离京由陆路南下广州。尽管这些年来他一直要求上级教会召他回欧洲，为的是找个安静的场所来完成他的学术著作，但他却从未想到他得如此匆忙地动身。傅圣泽在北京的上级仅仅给了他八天时间收拾行李、大批书籍和笔记。尽管傅圣泽雇了十六匹骡子并使每一匹骡子尽可能地多载，也仅仅刚能带走他那庞大藏书中的一部分。出于无奈，他不得不忍痛将一千二百卷书籍文件留下。那些无法带走的文件都是他匆匆记下的备忘录以及在书页空白处写有注释的书籍。这些文件中的一部分后来被装进三个箱子 由水路托运到了广州 但那已经是傅圣泽离开广州之后的事了。其他未能带走的笔记书信等足可堆成个小山包，但最后却无可奈何地遭到毁弃的命运。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人称“太阳王”。其执政时期（1643—1715）是法国封建社会最强盛时期。优雅的上层社会礼仪、语言及外交辞令得到高度发展，影响以后整个欧洲。政治体制上，路易十四加强专政的结果使得贵族势力变衰，中央彻底集权，权力则系国王一身，为以后法国大革命，全国陷入血腥残杀设下隐患。而其邻国英国封建制度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因贵族势力的加强，实施的是另一种较温和的模式。

傅圣泽原先期望他能赶上来到广州的法国东印度公司船只，借冬天的季风扬帆返欧时将他带走。他的上司也曾以同样的理由告诉他为什么会让他如此匆忙上路。然而，当他带病结束了艰难的严冬之旅于2月20日匆匆赶到广州时，却发现码头上没有一艘法国来船。傅圣泽不得不浪费整整一年时间，望眼欲穿地等待姗姗来迟的法国商船。那些本应抵达的法国船也算是运气不佳，竟然因各种原因错过了东南亚季风而无法在冬季到广州，不得不在海上白白地漂悠了整整一冬。

傅圣泽自己的中文藏书在广州被重新整理打包装进了十一个大木板箱内。此外还有其他七个大木板箱里面塞满了傅圣泽在南京书市购买的中文书籍。那些书籍是准备送给巴黎国王图书馆的。傅圣泽负担了该批书籍的部分书款，余下的由法国东印度公司负责。但总的说来最使傅圣泽操心的还是他自己的那十一个大木板箱里面注满了他毕生研究的心血。其中有他翻译并诠释、自认为最能阐明真正宗教奥深意义的中国古籍。他深信他的诠释可以拯救因在中国的错误传教方式而逐渐失去民众信仰的天主教传播工作。傅圣泽的这十一个大木板箱里共有近四千册左右的书籍和文件。他钟爱地把它们分类为十四个不同的项目。

在中国的经典中，“五经”具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其中的《易经》和其他四本古典构成了礼仪、诗歌和历史的正式典籍。这五部经典再加上孔子的《论语》以及其他著作，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所用的基本教材，它们和中国各朝代的历史共生共存。在中国原始宗教的道教中，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以及一般的古典注释、哲学思索、科学、政府、教育以及礼仪中全都深深地烙有“五经”的影子。佛教经典则被排在正式典籍中的末位。一般认为佛教代表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佛教经典往往与注释的虚构故事搅在一起。譬如，明代以流浪汉冒险事

迹为题材的佛僧去印度取经之《西游记》以及那些成打的由各种天主教传教士用中文编写的题材都可作为不错的例子来证明傅圣泽的这一论断。傅圣泽还亲手写了长达四十八页之多的分类条目，来为自己的这一论断作证。

傅圣泽神父总共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在中国，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证实三个他已经基本洞悉的研究上：1) 中国原始宗教经典是神圣的，它们是真正的上帝亲手交给中国人的，如《易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 中国圣书中提到的“道”代表了同一真正的上帝，也就是对耶稣的信奉；3) 与天主教相同的神圣重要性在中文哲学词汇“太极”中也得到了体现。“太极”在众多的经典中屡被使用，而它与最根本的宇宙真理有关。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对怀疑其观点的人，甚至敌对的上级，傅圣泽将他们的论点都逐字逐句一一录下。他甚至还将这些论点逐条单列，并将它们收进自己特编的专题论集中。此外，他在自己的论点中多处引征《易经》，以旁证他最大的研究成果。举例来说，中国人相信有超自然的神圣力量。那种所谓的神圣力量超越欲望和世俗的混杂，存在于静静肃穆的冥冥宇宙之中。每到春天，它不奈寂寞而动，从而使万物成长并惠助人类。傅圣泽因而指出如能正确阅读《易经》应该很容易从《易经》中发现诸此万物的欲望已经降临到人间。《易经》中伴有数千个诡秘的说明，恰如基督化身随带的暗示。又譬如，《易经》中的第十三个卦形，明白无误地讲出了生命的来源（the Coming of Emmanuel），以及失去了天真的世俗世界的悲哀。而第十四个卦形

中国古代以“—”代表阳，以“--”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排列组成八种不同形式，称为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不同事物。以八卦互相搭配又可得六十四卦，以象征自然和人事现象，当时多用来占卜。《易经》对八卦诸形及所示现象有详细论述。

则显示了恶敌将如何在三个长长的年头里与上帝作战并反抗上帝的律法。再譬如 第二十四卦形讲的是万物诞生 第四十九卦形则讲的是当上帝的羊群 各自走散后 上帝要将其中较大的一群带回家之意图。傅圣泽根据他这样的研究观察而下定论道：“当天下大众重新团聚时 八卦明白无误地预言出 人类最早的国家会更新 那将是整个世界的首次洪福。届时，一道宏伟炫目的亮光将普照世界各民族。芸芸众生将因而所知他们至高无上的主就是上帝 他们也将因此而臣服于上帝。”

以上就是傅圣泽的研究要点。傅圣泽的激情所在就是掀去蒙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某些词汇语义的光华纱巾，使其原意大白于天下。那是何等伟大而鼓舞人心的工作：“如此大业令人越干心越甜 再苦再难我也感到津津有味，其乐无穷。”

正因为如此，这项工作既费时又艰巨无比。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傅圣泽已将多年的宝贵时光浸沉于研读早期的中国古籍，以期找出通往真谛的线索。工作之艰巨还体现在：仅仅誊写一小部分章节就需数天甚至数周，尚且还有那么多的其他事情要做。当傅圣泽在北京的时候，他曾经拥有过几个中国人秘书和助理。那些助手不但帮他誊写大篇的中文章节，还学会抄写他用意大利语、法语和拉丁语写的信件。有趣的是那些秘书助理对外语虽然一窍不通 但他们将薄薄的宣纸铺在原稿上 按原稿的外文字母依样画葫芦，誊写得惟妙惟肖。可惜的是好景不长，1718年，有人暗中指责傅圣泽使用中国助手的行为违反了传教士甘愿保持清贫生活的誓言，傅圣泽的上司们于是一致决定禁止他再雇用任何中国人。对这样的决定，傅圣泽情绪上相当抵触，他认为上司反对他雇用中国人的真正原因绝对是醉翁之意